

1990年卷

# 活页文史

## 总刊

主  
编 周本淳

副主编 萧兵（执行） 钱仓水



# 活页文史必列

(1990年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主 编：周本淳

副主编：萧兵（执行） 钱仓水

编 委：周本淳 萧 兵 钱仓水  
魏家骏 张弦声 蔡铁鹰

活页文史丛刊 （1990年卷）

---

责任编辑：弦 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市新豫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9.625印张 236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

ISBN7—5348—0343—8/I·172 定价：4.00元

# 新考释学：传统考据发展之尝试

——新版《活页文史丛刊》代前言

萧 兵

《活页文史丛刊》是个保守性的刊物，主要内容是被当做老古董的考据学，从1980年到1989年在学术界内部发行。它的缘起，是江苏省淮阴师专中文系于北山、周本淳、颜景常、程中原诸教授热心提倡，学校的历届领导又非常重视“以科研提高教学，用教学推动科研”，不惜工本让它年年出刊。国家教委、省教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加以支持。大概是因为这类刊物太少，海内许多专家学者便慷慨赐稿，所以十二辑近300号论文，名家迭出，佳作屡见，虽获“功在士林”之誉，却貽“权威崇拜”之讥。我除教学、科研外，尸执主编之责，人微言轻，位卑学浅，难免“拉起虎皮当大旗”，但也衷心感谢海内外前辈学人的鼎力相助。它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影响，屡被征引评述，并为海内外一些名牌大学图书馆所收藏。但究竟只在小圈子里流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1989年春，正值大腿横飞、剑光乱舞、纸价暴涨、学术萧条之际，中州古籍出版社却主动提出合编此刊，且予公开出版，高山流水，喜遇知音；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但愿它能在振兴中国学术的悲壮努力中克尽绵薄，底于有成。

考据学是中国学问的基础，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昂首天际、傲视古今的。然而，正如我在《美国访学散记》里所说，传统考据学正遭遇最大的挑战和危机，往昔的强大与光荣已成过眼云

烟。“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我们这些白头宫女，看来也只能“闲坐说玄宗”，为“希腊的光荣，罗马的伟大”，或是先秦显学、乾嘉盛世之类唱一曲挽歌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最大特点是高质量、高信息、高效率。自然科学和技术不断侵入文史科学的传统领地。电子计算机确实已能代替旧式学者的某些手工劳动式的操作，诸如编目、索引、缀合乃至注释、整理、校勘等等，已多少能由电脑担任或协助。考据学已到了不革新便无法存在的生死关头。但是，即令是在旧考据学的范围里，电脑暂时也还不能完全代替人脑，前者不可能把“辨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全包下来，更不用说“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了。《活页文史丛刊》很想在这方面做些拾遗补缺的事情。

但这还不是新版《丛刊》的主旨。她希望跟北京的《文史》、上海的《中华文史论丛》有所区别。我们提倡的是“考释学”，或称“新考据学”（早在1978年，我在一封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中已提出这个建议，在内刊发表）。建立一门新学科不是构拟几个玄妙莫测的新术语就能奏效的事情，它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对象乃至术语、概念的体系。“考释学”尚未具备这种条件。它只是一个老学科在新条件下的“复归”，所以暂时不能要求过苛。它企图在考据的基础上以多元化的方法对中外古今文史方面的疑难进行破译或解释，着重于文本的“叙述层次”（显义）和“内容层次”（原义），如果条件许可则尽可能楔入其“象征层次”（喻义）和“背景层次”（潜义），但后者不是它的重点。这就决定了它既不同于侧重“文本”叙述层次（语言文字层）的传统考据学，又不同于深入“本文”象征层次（哲理层）的“阐释学”或“意义学”，复不同于强调两者背景层次（条件或环境层）的历史学。它是既考且释，考而后释；纯粹的考据，一般的解释，不能算是“考释学”。这样，它的研究范围自然而然地就限制在中外古今包含着“要谜”或疑难的文史问题

之上。

它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个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学风。创造、能动地发展实践唯物主义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提倡的方法是“多样化”，证据也要求是多重和综合的；因为“破谜”和“译码”往往要求各种手段、技术一齐上，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当然，不管怎样“跨学科”，考证总是它的起点和依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更是打开历史文化宝库的金钥匙。中国学问虽然考据、义理、词章并重，但是最讲究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象的来龙去脉、学派的传承发展、问题的源起流变，都要弄个一清二楚。这样，尽管可能沦为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却能保持着一种优越的历史态度和竞赛意识。

大概是文物鼎盛、文明悠久的缘故吧，中国人的历史感最强，时间价值取向多呈“过去式”，是所谓倒T型。所以，不但古代儒家喜欢述三代，追尧舜，近现代学术也多集中注意于先秦乃至远古。加上现代考古事业发达，“史前文物”不断出土，“重大发现”屡有所闻，殷墟周原甲骨的发现更加耸人视听，受过旧学熏陶的老一代精英便很自然地“言必称三代”，应了“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老话。特别是1949年前，一套《古史辨》、数十本史语所《集刊》、几家权威学报，几乎全是夏商周的天下。予生也晚，虽然未能躬逢其盛，耳濡目染，却也难免喜欢附庸风雅，追慕昔人。闻一多、郭沫若、陈梦家、徐旭生、丁山、杨宽诸大师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这样，我执编的《活页文史丛刊》当然会较多发表同仁和友好们考据探讨上古文化和传说时代的文章——就怕今后也不免如此。它的坏处似是“脱离现实”，好处却在它能使学术保持一种冷静、客观、超脱而又严峻的风度，以追求自由、沉思真理为己任、不偏不倚、不亢不卑、不热不冷、不即不离，从而使它富有“过期使用价值”，不因时过境迁、风向变化只好进废纸

筌。而且，从学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来说，每一课题或研究对象，总有其前因后果、发展过程，追本溯源、寻根究底是“考释学”题内应有之义。发生学的要义之一便是通过“起因”的追索来发现事物的规律——“来源”和“本质”常常呈现某种一致性。例如，谈到中国文化、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学术界和文艺界人士都讲究“寻根”——这“根”便扎在中华各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社会结构或历史条件里，民俗神话传说便是民族灵魂之所归趋。这一“追”便“追”到炎黄颛顼尧舜禹头上去了。所以，仅仅把近代史当做旧中国发展迟滞性、传统衰老性的原因是目光短浅的，是那种急功近利的极左思潮要求学术为其狭隘浅薄的利益或目的效劳的必然结果。学术自有其规律和尊严，它追寻的是客观的真理，要求的是本身固有的自由——人类及其文明的历史本身便是一部走向自由的历史，亦即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它便有起源发展和演变。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学术不必也不应拒绝、害怕和回避什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研究无禁区”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这意思既广泛又深刻。自然和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四维空间”——也就是“历史”里。“现在”转瞬便成为“过去”，“未来”顷刻就变做“现在”，一切的权威和真理都处在这历史的长河里。“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它包含着悲剧性和喜剧性，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消逝，更新。学术便是把这种“历史”当做唯一的对象，紧紧抓住已逝或将逝的历史现象加以剖析和复现，展示其前因与后果，过去和未来。这也是“考释学”爱把历史疑难和源头流变当做自己的研究课题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决不是说研究近、现、当代的文章便是趋炎附势、随风转舵，没有学术价值，而是说，要公正客观地对待一切真学术、好文章，不因其“古”而废弃，不为其“今”而鄙夷。我们

也要尽力扩大作者和读者群的覆盖面，还希望销路不致过窄、赔本不要太多。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考有释，推陈出新，都优予发表。我们特别欢迎那种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思索，资料丰富、考据精审、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既能启发心智、推进改革，又有稳定而久远的学术价值的好文章——每期如果能有这么三五篇的带头文章、“拳头产品”，读者便非掏腰包不可，学术机构不保存也就不行。特别是对于使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手段（包括自然科学技术）考释、研究文史问题的文章，我们不但提倡，且予优容。哪怕不太成熟，或者艰奥偏涩，甚至惊世骇俗，我们都不吝篇幅。这也可能是敝刊有别于同类刊物的一个“特色”，而特色便是杂志的生命。

真理的确是朴素的。绚烂至极之极归于平淡——科学的结论往往简单明了，甚至平淡无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但这里也有个尝试和锻炼的过程。炉火纯青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境界。所以我们不排斥那种出奇制胜、石破天惊的文章。况且，疗疾救世不避苦重之药，振聋发聩时需霹雳之声。有些文章看起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真知灼见也许便包裹在“怪论”里。所以就作者而言，要尽可能做到充实，严谨，平易。文章千古事，白纸黑字，想改也改不掉，要经得起实践和逻辑的双重的检验。就读者、编者而言，却不能求全责备，而应该“兼包并容”，不拘一格，择善而从。这样，每辑发表一两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却又多少有点儿奇怪突兀的文章，自有我们的苦心，希望学术界，读书界能够予以宽容和谅解。

## 目 录

### 新考释学：传统考据发展之尝试

——新版《活页文史丛刊》代前言……………萧 兵（1）

#### · 中国史专题 ·

### 历史、虚构与中国叙事文学之阅读

…………… [美] 余国藩 著 李夷学译（1）

### 从印度洪水神话的源流看文化的传播与异变

……………叶舒宪 王海龙（29）

古代典籍所见双系氏族血缘及其若干含义……………屠武周（45）

#### · 艺术考古文物专题 ·

### 四方和十字

——兼论黄帝四面、方相四目以及方明、

明堂、甲冑等的象征符号功能……………萧 兵（59）

将军崖岩画与女娲的古史传说……………李洪甫（98）

王弼“大音希声”美学思想发微……………胡 健（105）

#### ·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

### 《西游记》成书的关键中介

——《礼节传簿》的再发现……………蔡铁鹰（111）

《蜃楼志》版本经眼录……………来 星（125）

### 《老残游记》与《邻女语》成书疑案

——连梦青撰著《邻女语》说存疑……………张 纯（133）

跋——刘大绅《著作〈老残游记〉之源委》

不可信……………蔡铁鹰（137）

· 中国现代文学专题 ·

现代散文分类 ..... 钱仓水 (143)

· 语言文字专题 ·

中国语文研究的词类学传统 ..... 申小龙 (157)

柳暗花明：迈向篇本位 ..... 马 啸 (173)

关于章黄古声组说的若干问题 ..... 李葆嘉 (183)

佛教对汉语的影响 ..... 梁晓虹 (139)

论汉民族之偶数崇拜 ..... 洪 波 (205)

“左、右”的性文化意义 ..... 刘宁波 (219)

· 图书文献专题 ·

读常见书札记 ..... 周本淳 (228)

胡震亨关于《木兰诗》时地的意见

“河东狮吼”辨

一个标点的问题

中华书局《湘山野录》等书标点错误例释

辛稼轩佚诗三首

· 大中专文科教学研究专题 ·

章实斋之作文教学法 ..... 张熙侯(遗著) (241)

· 国际文化专题 ·

重建客体：文学领域中的灵魂冒险

——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及操作范型 ..... 魏家骏 (253)

非我的神话

——西方眼里的中国 ..... 张隆溪 (269)

· 补 白 ·

萧兵和龚维英的神话研究(摘要)

..... [日] 铃木健之著 于 雷 译 (57)

李商隐一首影射安史之乱的无题诗新探 ..... 陶 光 (191)

相逢有如旧相识

——中国小说“仙乡淹留”型故事一例 .....周 俐(140)

说恶

——《方言与古义》 .....王海根(132)

“图”为“大”说

——《方言与古义》 .....王海根(156)

“发愤以抒情”创作规律的总结

——读黄中模《屈原问题论争史稿》 .....翟鹏举(123)

《楚源流史》：自成体系 .....邵子军(172)

《中国上古神话》：别具特色 .....邵子军(252)

## 历史、虚构 与中国叙事文字之阅读

(美) 余国藩 著

李爽学 译

专治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学者，习惯上都会提到散文虚构和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或者，更精确的说，他们都会注意到在散文虚构发展的过程中，其依赖历史撰述的程度。尽管据《汉书·艺文志》卷三〇所称<sup>[1]</sup>，“小说”一词乃起源自街谈巷语，或为稗官小吏所采集，目的在反映社会状况，但其往后之衍称如“野史”与“稗史”等，却都指出这些新立的名目，已经不再自囿于“小说”的原始形式，也正确的超越了其模仿者早先接受的叙事观念。

“野史”或“稗史”的新称，或可为我们指出虚构性的叙事文学的一项特色，即：“事实”与“未经证实的事实”，彼此亦可由构成上的特色而共冶于一炉。当代学者马幼垣在定义中国的讲史小说时，因而提供了如下的描述：

……讲史小说，是指以史实为核心的小说；它艺术化地融合事实与想象，在人物及事件的描述上有创新的发挥，但不违背众所皆知的事实。<sup>[2]</sup>

上面的陈述，很明显的是在强调题材或马氏在另一专文中所称的

“实质的写实”<sup>[3]</sup>。可惜的是，马氏的界说对于“事实”与“想象”，在形式上可能拥有的共同点，着墨并不多。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历史在披上小说的外衣之前，到底能享有多大程度的“创新”。同样的，虚构作品在发展成为历史的时候，“不违背众所皆知的事实”的幅度可以有多大，亦未尝齿及。

实际上，“事实”与“想象”的结合，不仅会牵涉到讲史小说的定义问题，更重要的是，此种结合也是一深具意义的起点；从此一起点出发，尤可检视历史性的叙事与虚构性的叙事在形式上的共同处。这种情形，不独中国文学如此，证之西方传统亦然。

不论是出以口述或书写的方式，历史都是过去事件的言辞陈述，是一种“叙述出来的故事”<sup>[4]</sup>，因而也会具有多数叙事文学所共有的某些形式上的特征。职是之故，当代研究《左传》的学者，在探讨这部古代经典时，便会强调其中的情节，人物塑造与叙述观点等问题，也会借由其中融入的言辞对话、预言、戏剧化了的事件与轶史等，来加以阐明分析<sup>[5]</sup>。上述种种叙事上的特色，为史学撰述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环节，以便结合一些乍看无关的事件，使之成为一具真实性而又紧凑完整的故事。

然而，如就历史系“过去事实”的陈述一点而论，却不免会引发下列诸问题：“历史事实”究竟为何？如从一般考证史实的标准来看，有哪些事实“确曾”或“不曾”在历史上发生过？历史的因果律又是否可以为人确认？上述对于“事实性”与“可考性”的关怀，点出来的正是区分“事实性”与“文学性”时应该考虑的一些事项。

长久以来，一般学者都认为希腊上古的荷马诗人和史学家，彼此皆具有共同的叙事传统，尤以他们惯以第一人称行文的方式为然，但是当代学者却迫不及待的指出，由于希腊的史学家（*histor*）力图将他们的叙述置于一种新的权威感之上，所以诗人

和史家的叙事态势，确实有所不同。Histor一称所指的，毕竟不仅是类似“歌者”（*acide*）、“编连歌者”（*rhapsodos*），或是“制造者”（*poiētēs*）等等的事件的“记录者”或“重述者”；他们更是“询问者”与“调查者”。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名著《历史》（*Histories*）中，曾为特洛依的争端提供过有关波斯人与菲尼基人的故事。接下来，他又说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说此一故事或彼一故事确曾发生过。然而，对那些我所知的曾对希腊人造成无谓的伤害的人，我却会予以指名道姓一番，然后再继续讲我的故事……”（*Herodotus*, 1, 5）。希罗多德式的记史，不仅保存下来希腊与其他民族早期的事迹，以便对抗时间的腐蚀，而且还是出诸一种自觉性的渊博（*tō chronō exitēla*—*Herodotus*, I, I）。这种著述之法，亦可在中国大史学家司马迁（C.145?—C.90? BCE）的著作中，听到类似的声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谓：“若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则其“罪莫大焉”。由此观之，则司马氏在提到自己的名山之作的撰述动机时，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传也，非所谓作也”（卷一百三十）一句，便不仅是一种谦虚，不敢比美孔子之作《春秋》，更是一种强调，说明其作品真正的本质为何。虽然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不曾声明他们能够从事今日业已成形的史学论述，其著作中亦短于一见今人著作中常见的有系统的旁征博引，而且严谨筛选证据的态度更是付诸阙如<sup>[6]</sup>，但是他们各自的作品里，却一再显示出他们确实具有探索事因的严肃精神。在评论古希腊的史家时，有两位当代学者曾经观察道：“传统诗人只能局限自己于一种故事的说法的地方，史家却能同时取材自各种矛盾的说法，以便探索事实或真相。修西地底斯（*Thucydides*）是上古史家最完美的典型；他在史学上的权威性，不但建立在擅于搜罗证据的事实上，更因其著作的结论每每精确无比有以致之”<sup>[7]</sup>。

谈到这里，若有人追问道：所谓“历史证据”究竟应该具备那些条件？对于这一个问题，我想阿诺德·马米格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可能会回答道：“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据，必因其有确切可考的日期使然”<sup>[8]</sup>。易言之，能够流传下来当证据的线索，必定曾在时间的顺序上，留下足以形成“事件”的特色的痕迹。这种对于事件的“时间性”的重视，亦可在中国史学强调的“记言”与“记事”等重要的语言观念之中，寻到对称的说法。史学上所称的“空言”，不论其真谛究为“浮泛无稽之言”，或有特殊的指义和“理论的形态”等，由于皆具有“不可考”的性质，故常能让人体认到语言所蕴涵的叛逆性的问题<sup>[9]</sup>。中国思想上“实事”与“空言”的对立，或亦因此而引发。董仲舒（C.179—C.104 BCE）认为《春秋》之作，便是因孔子自述的下列动机而来：“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于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司马迁的“自序”中，亦让笔下的孔子说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史记》卷一百三十）。同样的，班固（32—92）在《艺文志》中，亦引孔子论国家之礼必得有“征”（《论语·八佾》，第九章）的观念，来支撑他对《左传》的撰述动机所持的看法：“夫子不以空言说经”（《汉书》卷三十）。这种语言思想得与事件结为一体的需求与强调，数世纪来迭经学人所确认，是故，清代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文史通义》开宗明义便说道：“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sup>[10]</sup>。

章学诚坚持史学撰述上“言”与“事”不可分的态度十分强烈，以致于他几乎毫不考虑的就质疑起传统上已定于一尊，业经学界公认的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动”的说法。他说：

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见于后世，……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

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sup>[11]</sup>

由于《尚书》中的〈典谟〉、〈禹贡〉与〈洪范〉诸篇，有某些讹误的条项，刘知几（661—721）更据此而取笑《尚书》中所揭橥的一些原则与典范，认为皆不足采信。类似这种的疑虑，或许便是后世“空言”亦能引人怀疑古事的方式吧？

尽管章学诚扩大了历史的定义，连六经都可含摄在内，但学界却因此而吵扰不休，屡为历史的真谛与原则而大展辩舌<sup>[12]</sup>。不过，在章学诚的观念和大部分的史论中，最值得我们细究的，却是有关历史证据的足够性与局限性的问题。就算史家的理想是要“从古人”，而且也不该耽于一些不必要的理论，那么一旦需要时，他为完成著述，能“离事”有多远呢？要填补史事的罅隙，弥补散佚的部分来成就一部贯穿古今，言而有征的“过去之事”的“陈述”，史家又能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以便发挥想象力呢？

早在修西地底斯之时，西方史家即已认识到上述这些历史言谈上的基本问题。在传统上，西方史家认为，这些问题所以惹人注目，系因其乃“事实”（资料或讯息）与“诠释”（解说或“谈及事实的故事”）必然的“结合”之故<sup>[13]</sup>。诠释的行为，可以从一种似真的呼吁之介入开始（孔子绝粮于陈时，可能就会这么说吧），或从个人行事动机的讨论着手，或再申而论之，从历史因果之发现而形成的拟“阅读大段时间”的动机引发。后一起点，还涉及到为“类型”和“排列”命名，为“事件的外观和内延”描述等动机<sup>[14]</sup>。修西地底斯因而说道：“在战争前夕或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演说词，不论是我耳闻或他人转述给我的，我都很难记得十分精确。所以我一方面尽可能的保存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

另一方面，只要时机必要，我也会模拟情境，让演说者讲出他们可能讲出来的话”（*The Peloponnesian Wars*, 1, 22）。

对希腊的史家来讲，要让笔下的人物道出在时机必要时所“可能讲出来的话”，便不啻是强要他自己来发表高见：他得揣摩、归纳，并比拟事件中的人物的思想与可能说出的话。这种写作行为，依柯灵乌（*R. G. Collingwood*）的看法，便是“史家心中所存的过去思想的再制定”<sup>[15]</sup>。当代西方史家或许会认为，我们与其同意柯氏所谓历史即思想史的看法，还不如肯定他在诠释理论上所具有的浪漫倾向（如其称司来马赫〔*Schleiermacher*〕的诠释观念，基本上是心理预言与心理复制〔*nachbildung*〕）<sup>[16]</sup>。虽说如此，西方史家当会认同柯氏所谓的史学写作上的“建设性的想象力”的必要性。资料——或者说事实本身——尽管呈现的方式或如潮涌，并不能结构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故事，也不能为故事性或探讨性的历史锦上添花。想要达到上述的言谈水准，得对事实或证据加以严谨的确定。而这种工作，不过是史学撰述过程里，诸多旷日费时甚耗心力的工作的第一环。所有的资料，都得在此一环节上筛选，才能凝聚成为史家能够运用的材料。这一切，在史学撰述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分割；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得好：“‘事实’只有在言谈需要时，才会呈现出来，也才会有人设法加以掌握。其呈现与掌握的目的，是要‘批准’事实所需的诠释。后者的力量，源出言谈中能呈现事实的秩序与方式所带来的真实性。言谈本身，实则为事实与意义的结合。这一类的结合，会在自身加上某一‘特殊’意义上的结构中的一个特定层面。至于‘意义’，我们亦可视之为历史意识的产物，而非其他东西的产物”<sup>[17]</sup>。上引怀特的话，实为柯灵乌所谓的“建设性的想象力”最佳的注解。对柯氏而言，这种想象力“既为‘先验性的’（*a priori*，意指不会任意更动），也是‘建构性的’（*Structural*，指：能为架构思想的题材的形式上的一贯性所